



辨名與定分—— 一個都市泰雅青年的身分備忘錄

名前の判別との身分の確定——都市に住むとあるタイヤル青年の身分備忘錄
Differentiating Names and Establishing Status: A Personal Status
Memorandum of an Urban Tayal Youth

文・圖 | 李昊哲Yuhaw・Rimuy (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三年級)

202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與《原住民身分法》的修正，無疑是台灣原住民族權利發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嶺。隨著長久以來備受爭議的姓氏門檻正式解除，法制轉向採認並列傳統名字更具彈性的方式。這項變革將選擇權交還給個人，充分保障了原住民族後代的個人認同權，讓許多徘徊在體制外的族人，得以名正言順地重返主流社會的視野。然而，在我們為人權進步與包容性喝采的同時，不容忽視的隱憂也正浮出水面。當法制門檻變得寬廣，身分的取得不再與家族認同或部落生活的實質聯繫緊密綁定，民族的邊界正悄然變得模糊。許多族人與學者開始擔憂：我們是否即將面臨如部分客家族群般文化特徵逐漸稀釋、消失的困

境？當一紙身分證明不再必然等同於對文化的承諾，原住民族的主體性該如何維繫？

身分代表的意義

在過去，法律條文與血緣姓氏是維繫民族邊界的壁壘；但在身分認定條件鬆動的今日，這座壁壘已然頹傾。這意味著，民族教育的角色被推到了空前關鍵的位置。如果法制的鬆動是不可逆的時代洪流，那麼教育就是我們必須築起、且唯一能深耕的文化防線。我們面臨的挑戰不再僅是教什麼，而是如何引



小時候在水蜜桃收穫季，回到位於新竹縣尖石鄉嘉樂部落的老家。

導。我們必須深刻反思，教育體系該如何接住這些帶著不同生命經驗與認同程度，來到校園的原住民學子？我們又該如何引導下一代理解，原住民族

身分，從來都不應只是升學加分或獲取優待資源的工具。當取得身分的外部阻力變小，我們更需要透過教育，在孩子心中建立起強大的內部動力與深層的文化使命感。真正的身分，不在於戶籍謄本上的註記，而在於願意回頭認識自己的根源、開口學習族語、理解並參與部落事務。這是一份對祖先與土地的誠意，更是一份願意在當代社會承擔起文化傳承義務的責任。

從法制變遷的影響評估、教育現場的第一手觀察，到對文化傳承機制的解方探討。我們期盼透過這些激盪與對話，能在身分認定條件鬆動的當下，為原住民族教育尋找一條堅定的出路。當法律不再負責篩選誰是原住民，教育就必須承擔起養成原住民的重任。我們需要共同思考如何讓每一個掛上原住民族身分的孩子，都能驕傲且踏實地接下祖先交託的文化火把；讓我們的民族在未來的台灣社會中，不僅是透過姓名找尋文化的根基，更能延續真正的靈魂。

都原青年的身分認同

從小在都市叢林裡長大，對我而言，「原住民族」這四個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僅僅是戶籍謄本上的註記。母親是

泰雅族，但我沒有經歷過部落的歲時祭儀、不會說母親的母語，甚至在成長過程中，刻意或不經意地隱藏了這層身分。直到進入大學，在這裡接觸到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探討，身邊的同儕對我的態度使我放鬆下來，讓我好像脫下枷鎖一般，可以自在地去學習，學習關於我的外婆、與這個族群的一切。

202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出爐，《原住民身分法》迎來了重大修正。身分的取得不再被綁架於從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的單一選項，門檻的鬆動讓許多像我一樣在都市長大、因現實考量未曾改姓的原民二代，得以更順利地取得身分。然而，這也隨之拋出了一個叩問，當法律的外部門檻降低，我們內在的文化羈絆是否也跟著鬆脫了？

有人問我，取得原住民身分，究竟是為了爭取資源，還是連結母親家族的開始？我的答案毫不猶疑是後者。如果身分只是一把開啟特殊優待的鑰

如果法制的鬆動是不可逆的時代洪流，那麼教育就是我們必須築起、且唯一能深耕的文化防線。我們面臨的挑戰不僅是教什麼，而是如何引導。



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新光國小。

隨著認同的深化，在實踐文化的路上不斷學習，我開始明白，這些權利從來都不是因為血緣憑空掉下來的紅利，而是國家針對過去剝奪原住民族土地、語言與文化，所做出的行政補償。



匙，那麼它將變得無比廉價。對我來說，這個身分的確認，更像是一張遲來的歸鄉車票。因為這個身分，我有了正當的理由與強烈的動機，去追問母親當年的部落記憶，去理解外公外婆走過的那段因同化政策而噤聲的歷史。這不是資源的掠奪，而是一場自我拼圖的尋回之旅。在求學階段，身邊非原民的朋友最常討論、甚至帶有微詞的，莫過於升學優待這項權利。他們有時會半開玩笑



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秀巒部落的農田。

地說：「真好，有血統就有加分。」過去的我，面對這些話語總會感到心虛與自我懷疑，甚至覺得自己是個不夠格的既得利益者。

身分鬆綁源自被剝奪的文化

但隨著認同的深化，在實踐文化的路上不斷學習，我開始明白，這些權利從來都不是因為血緣憑空掉下來的紅利，而是國家針對過去剝奪原住民族土地、語言與文化，所做出的行政補償。母親那一代失去了用泰雅語流利對話的環境，導致我在都市裡成為一個失語的泰雅青年，這正是歷史結構留下的傷痕。然而，這份補償並非毫無條件。當我選擇承接了這個身分，享受了這份補償，就意味著我必須簽下一份無形的契約，我必須把國家補償給我的教育資源，轉化為傳

承與復振文化的能量。這份權利，本質上是一種責任的預支。因為認同起步得晚，我深刻感受到一種追趕不上的焦慮與壓力。在原民社團或文化課程中，面對那些從小在部落長大、深諳歷史脈絡的同儕，我時常會陷入「我不夠原住民」的冒牌者症候群。我必須花費比別人更多的力氣去學習族語、去建構對原住民族歷史的認知。這種傳承文化的壓力是沉重的，但也是這股壓力，時刻提醒著我不可懈怠。

同時不可否認且遺憾的是，與我同樣在都市長大、擁有相同處境的人們，並非都抱持著相同的想法。對部分人而言，身分認定條件的鬆動，確實讓他們將原住民身分純粹視為一種工具。他們在升學考試時披上這層身分，在日常生活中卻對族群議題漠不關心，甚

至與部落毫無實質聯繫。這種現象令我感到憂心。這正是我們在探討身分認定條件鬆動下的原住民族教育挑戰時，最不願看見的發展，當法制不再強勢規範民族邊界，若個人也放棄了對家族與部落的實質認同，原住民族的文化特徵將如同被水稀釋的墨汁，最終褪色消亡。更讓我不忍的是，再過幾代，原住民族的人數會因為法律條文的變革而增加，但民族邊界也不斷的模糊，對家族、族群的認同感不斷下降，這會變成一份不平等的契約，在享有福利的同時卻不願承擔相應的責任，這是我們不樂見的。

我必須承認，認同與學習文化，是一件不容易且令人感到步履蹣跚的路程，但必須有人去實踐，去赴湯蹈火；同時很慶幸，令我感到幸福的是，我身邊的原民朋友都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，為文化的傳承延續而努力。

身分的認定與文化的責任

憲判字第4號判決是一座里程碑，它用更寬容的姿態接納了流浪於邊緣的原住民族後

代。但法律的寬容，不應成為怠惰的藉口。

作為一個起步較晚的都市泰雅青年，我期許自己，也期盼所有在法制鬆動下取得身分的年輕世代，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戶籍謄本上的那幾個字。我們必須主動跨出步伐，用學習族語、認識歷史、關心部落的實際行動，向世界、向曾經接受過恩惠的自己證明，證明我們承接這個身分的誠意。因為原住民族身分，從來就不只是一項權利，它是一份我們必須用一生去實踐的文化責任。◆



泰雅族傳統瞭望塔Lapaw（圖片來源：國家文化記憶庫）。



李昊哲 Yuhaw · Rimuy

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人，泰雅族。2005年生。目前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三年級，雙主修歷史系，現為師資培育生，並擔任政治大學第31屆搭蘆灣社長。致力於學習民間口傳文學的保存紀錄，與原住民族教育的學習與推廣。